

Kauder, E. (1957).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roots of the older Austrian school. *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Journal of Economics*, 411-425.

熊越 译

本文仅供研究使用，不一定代表译者观点

老奥地利学派的智识根源与政治根源*

埃米尔·考德 (Emil Kauder)

伊利诺伊州卫斯理大学

美国伊利诺伊州布卢明顿

1. 经济思想史上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经济学家的定理和方法既对作者所处的社会、哲学和文化氛围有贡献，也受其影响。经济思想史家已经看到了这种关系¹。因此，重农主义者、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智识背景已经得到了反复的研究。对奥地利学派的类似分析十分少见²，尽管它们是需要。如果我们知道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思想的哲学根源以及他们与奥地利智识氛围的联系，我们在此专门讨论³的他们的经济体系就能得到更好的理解。门格尔的方法论著作是这种讨论的最佳出发点。

2. 门格尔与瓦尔拉斯

在争取认可的过程中，门格尔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他画出了一条战线来反对历史学派，另一条来反对以瓦尔拉斯和杰文斯为代表的新数学方法。门格尔与施莫勒的争吵是众所周知的。奥地利学派和西方边际主义者之间

* 非常感谢奥斯卡·摩根斯特恩 (Oskar Morgenstern) 教授、小卡尔·门格尔 (Karl Menger, Jr.) 教授、冯·梅灵 (von Mering) 教授、雅各布·维纳 (Jacob Viner) 教授和雷蒙德·德·罗弗 (Raymond de Roover) 教授的帮助和建议。这篇论文是为了纪念英年早逝的作曲家弗兰克·博恩霍斯特 (Frank Bohnhorst)。

¹ H. Albert: Ideologische Elemente im ökonomischen Denken. Logische und soziologische Aspekte der Ideologiekritik, *Kyklos*, Vol. X, 1957, Fasc. 2, p. 194, et seq.

² 大部分涉及奥地利学派背景的论文是由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N. Buchari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1927. F. Behrens: *Hermann Heinrich Gossen oder die Geburt der „Wissenschaftlichen Apologetik“ des Kapitalismus*. Leipzig: 1949. A. Fuchs: *Geistige Strömungen in Österreich 1867--1918*. Wien: 1949. 在我的论文中找到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性讨论: *The Retarded Acceptance of the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LXVII, November 1953, p. 571, et seq. Reply to John P. Henderson's Comment. Same Journal, Vol. LXIX, August 1955, p. 476. M. Gottlieb 撰写了一篇来自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有价值的论文。不幸的是，它还没有发表。(M. Gottlieb: *The Ideological Influence in Schumpeter's Theory of Capitalism*. 在 1953 年中西部经济学会会议上提交讨论的论文。) Graziadei 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他的著作 *Le teorie sull' utilità marginale e la lotta contro il Marxismo*, Milan: 1943 中，他部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³ 我觉得把本次初步考察限制在三位创始人身上是有道理的，他们的共同点比后来的几代人多得多。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比他们后来的追随者更受奥地利传统的影响。

缓慢增长的紧张局势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忽视。然而，通过分析区分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原则，可以最好地理解维也纳学派在方法上的态度。

门格尔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和洛桑学派的区别。门格尔和他的年轻朋友们认为瓦尔拉斯和杰文斯是他们的战友。瓦尔拉斯反对流行的法国经济学家的过时学说，他们的喉舌是《经济学家期刊》（*Journal des Économistes*）。门格尔与历史学派的理念作斗争。门格尔、瓦尔拉斯和杰文斯发现了边际效用。然而，正如门格尔通过研究他的洛桑同事的著作⁴所发现的那样，接受相同的价值概念并没有建立一个共同的阵线。

他对经济问题的数学处理感到恼火。在 1884 年 2 月给瓦尔拉斯的一封信中，门格尔大发雷霆：“数学方法是错误的……（*méthode mathématique est fausse ...*）”⁵。1889 年，门格尔拒绝了奥斯皮茨-李本（Auspitz-Lieben）的价格理论，这是奥地利作者所写的数学巨著。庞巴维克以同样的方式论证，他怀疑会有许多读者有能力和意愿在一本研究经济理论的书中遵循代数或几何解释。“如果一本书始于

$$\frac{d}{dx} \varphi(x) dx + \frac{d}{dy} \psi(b - y) dy,$$

那么读者将不再理解，不再对这本书感兴趣⁶。”

并不是缺乏对数学的理解——旧奥地利“中学”的学生接受了全面的数学训练——而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坚信方程和曲线在经济理论中没有立足之地。同一封信中，门格尔试图向瓦尔拉斯解释他的方法。门格尔的私下交流带来了与他关于方法的书中相同的论点，但现在倾向已经改变：他不再与不可调和的敌人（即历史学派）作斗争，而是对假定的边际主义同志——他们陷入了数学的错误——的错误进程表示遗憾。根据门格尔的说法，我把错误和真理放在了一个对立的表中。

瓦尔拉斯的错误：

1. 数学处理数量。
2. 用数学方程表示交换法则。
3. 数学处理可测量因素的关系，用具有函数或相互依存的现象的现代语言。

门格尔的信念：

- 1a. 经济学不研究经济现象的数量，而是研究价值、租金、利润、分工、金银复本位等的**本质**。
- 2a. 方程只能导致任意陈述，而不是确切法则（*exact laws*，“*des lois fixes*”）。
- 3a. 经济学家必须用积木块建造一个像房子一样的系统。积木块是经济生活的简单要素，如需求、满足、财货。这些要素独立于人的决定而存在，它们迫使人进行财货的交换。通

⁴ 有关以下内容，请参见 E. Antonelli: *Léon Watras et Carl Menger à travers leur correspondance*, *Économie appliquée*, Vol. VI, Paris: 1953, April/September 1953.

⁵ E. Antonelli: *op. cit.*, p. 282.

⁶ E. Böhm-Bawerk: Book report on Knut Wicksell: *Über Wert, Kapital und Rente*.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Vol. 3, Vienna: 1894, p. 162--65.

过增加更现实的组合，这个市场经济可以逐步转变为实际经济。可以使用有共同起源的因果（genetic-causal）方法代替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

一般来说，门格尔的追随者们接受了这个反数学宣言的原则。他们可能从未读过这封信，但信中表达的想法是众所周知的，并且经常被讨论。

门格尔的想法很重要；它们揭示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思维原则。然而，在门格尔写给瓦尔拉斯的信中提出的所有三个原则都需要澄清：“本质”这个词及其形而上学的含义很少在奥地利学派出版物之外使用。不以度量为基础且不以代数或几何符号表示的确切法则几乎无法被形象化（visualized）。对于以英美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家来说，有共同起源的因果关系优于功能主义似乎至少是值得商榷的。通过阅读这些术语，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学术世界：只有通过回到这些术语背后的哲学来源——维也纳学派经济学家们对其十分熟悉——才能理解这一领域。

3. 经济本质

本质是指现象背后的现实。寻找隐藏现实的经济学家必须追踪社会结构和事件的永恒模式。这种 X 射线调查技术与我们的现代方法相去甚远。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并没有去探究浮动观察背后的永恒现实。他们处理日常生活的表象，这些表象被抽象和隔离归纳为简化的模型。该模型是一种工作假设。

“心理学方法不能容忍假设”⁷维塞尔在斥责年轻的熊彼特对旧方法的偏离时如此写道。对于门格尔和他的追随者来说，这个模型是日常生活表象背后的现实摄影。

相信本质是哲学实在论（realism）的一个原则。亚里士多德是这个学派最伟大的作者。著名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学者维尔纳·雅格（Werner Jäger）曾这样描述亚里士多德的理解理论：“任何真正的知识都预设了一个在心灵之外并被心灵所触动、复制和反映的主体⁸。”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⁹。在门格尔写下他的方法论之前，他非常深入地研究了亚里士多德。在晚年，他结识了冯特（Wundt）和康德¹⁰。康德的影响无法追溯，因为门格尔是在其漫

⁷ F. von Wieser: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Tübingen: 1929, p. 25.

⁸ W. Jäger: *Aristoteles. Grundlegung einer Geschichte seiner Entwicklung*. Berlin: 1923, p. 405.

⁹ 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科学思想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强烈影响，这一点首先由布拉格大学教授奥斯卡·克劳斯（Oskar Kraus）证明。通过对文本的批判性比较，克劳斯证明了亚里士多德、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归属（imputation）理论具有很大的相似性。（O. Kraus: *Die Aristotelische Werttheorie in ihren Beziehungen zu den Lehren der modernen Psychologenschule.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Vol. 61. Tübingen: 1905, pp. 573, et seq. 关于庞巴维克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参见第五章。）

¹⁰ 卡尔·门格尔之子小卡尔·门格尔教授与作者的交流。

长的文献沉寂期研究的康德¹¹。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可以得到很好的记录。门格尔作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学生撰写了他的认识论¹²。伟大的希腊哲学家如此教导，心智（mind）必须掌握什么属于一个事物的存在（being），它是什么，而不是别的¹³。同样，门格尔定义了经济生活的本质。“如果我们已经认识了它存在的原因（the reason for its being and its so being），我们就理解了这个现象¹⁴。”

“其存在的原因及其如此存在”是一个直接取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概念¹⁵。门格尔的希腊导师在这里澄清了他的本质概念：一个事物的存在与与质料（matter）相对的形式（form）密切相关。质料包含合适的材料。形式实现了质料的潜能。所以我们可以说成人为儿童所固有之物的形式。¹⁶“……是完整事物的形式决定了事先什么是适合该事物的原材料¹⁷。”“……是成品的性质激发并控制了将原材料转化为所讨论的形式的过程¹⁸。”因此，对存在及其如此存在的探索进一步进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领域，以区分形式和质料。

门格尔将这种形式和质料的分离应用于经济学。理论讨论形式，历史和统计讨论质料，即具体案例¹⁹。理论讨论精确类型和典型关系。这些理论类型提供了超越直接信息的信息。对于门格尔来说，每一个具体的案例，都“在我们脑海中呈现为普遍规律的例证²⁰”。门格尔的具体案例（即历史和统计提供的材料）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质料，它只包含潜能，而确切的法则和类型是实现潜

¹¹ 感谢村上秀夫（Hideo Murakami）先生的良好服务。我了解了在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第二版的未出版部分中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开头的一段很长的引文。门格尔的手稿现藏于日本东京一羽大学（Hitotsubashi University）图书馆。

¹² 门格尔的方法论并不总是被理解。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施莫勒过于偏颇，以至于无法理解对手门格尔的想法。（G. Schmoller: Zur Methodologie der Staats-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slehre. NF Vol. 7. Leipzig: 1883, p. 975, et seq.）但他甚至不总是在奥地利营地找到正确解释他的作家。当代作家 Dobretsberger 声称，门格尔相信基本概念是先天的想法。（J. Dobretsberger: Zur Methodenlehre C. Mengers und der österreichischen Schule. 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 1949, Heft 2-4; ebenso in: Neue 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theorie. Essays in honor of the 70th birthday of Hans Mayer, p. 78, et seq., p. 81, 87.）日本学者提供了其他康德式的解释（见村上秀夫的信）。显然，康德被误解了：康德的理性范畴在逻辑上先于观察，而不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思维形式。然后门格尔自己证明了他的认识论的康德起源。门格尔一再重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帮助创造他的科学哲学的作者。（C. Menger: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sbesondere. Leipzig: 1883, p. 35, 79, 80.）

¹³ B.A.G. Fuller :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 3: Aristotle, 1931, p. 43.

¹⁴ “... wir verstehen dieselbe (the phenomenon E.K.), wenn wir den Grund ihrer Existenz und ihrer eigentümlichen Beschaffenheit (den Grund ihres Seins und ihres So-Seins) erkannt haben.” C. Menger: Untersuchungen, ibid. 斜体为门格尔所加。

¹⁵ 对于以下讨论：B. A. G. Fuller: Aristotle, p. 52, et seq.

¹⁶ B. A. G. Fuller, op. cit., p. 56.

¹⁷ B. A. G. Fuller, op. cit., p. 58.

¹⁸ B. A. G. Fuller, ibid. L. Robin: Aristotle. Paris: 1944, p. 88.

¹⁹ C. Menger: Untersuchungen, op. cit., p. 26, 27.

²⁰ C. Menger: Untersuchungen, p. 33.

能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形式，即它们提供了适用于所有时间和地点的法则和概念²¹。

门格尔所创造的是最新理论与一种在 1883 年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哲学的结合。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庞巴维克赞成这种合成。维塞尔选择了他自己的方式来证明理论知识，但最终，本质还是在他的思维方式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维塞尔是维也纳学派的第三位先驱，与他的同事不同。除了奥地利传统，当代知识分子运动塑造了他对社会的理解。他是一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他在所有这些领域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他对本质的寻找中，他可能受到了狄尔泰（Dilthey）和齐美尔（Simmel）的影响，尽管他只提到马赫（Mach）和基尔霍夫（Kirchhoff）是其哲学的领路人。如维塞尔所写，我们通过聆听我们心智的内在体验，去发现精打细算（economizing）的本质，或者用他的话说，经济学的意义（den Sinn der Wirtschaft）²²。这种内在体验告诉我们，特定行动是在“感到必要性²³”的情况下实施的。门格尔认为经济学的本质在观察者之外的永恒形式。维塞尔在心智本身中发现了一系列必要的行动。他把他的程序称为心理方法。标签“心理”有些不精确；维塞尔的真正意思，是狄尔泰和齐美尔意义上的内省（introspection）。门格尔和维塞尔都声称，本质的（essential）东西也是必要的。法则、本质和必要性是一体的。

4. “确切”法则

在他关于方法的书中，门格尔区分了确切法则和经验法则。在门格尔的语言中，“确切”这个词并没有表达它通常的含义，即只能通过使用可测量的数据和数学公式才能达到的绝对精度。奇怪的是门格尔在用法语写给瓦尔拉斯时揭示了他的真正意思。他称他为确切法则，“des lois fixes”，关于不受时间和地点影响的不变序列的陈述。对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门格尔来说，这些法则不是我们头脑的构造，而是对经济生活中永恒配置的描述。维塞尔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但他的定律也是必要序列的公式化。门格尔和维塞尔并没有走相同的道路，但他们都瞄准了同一个目标，即经济学的永恒结构。他们设想了一个没有一切历史特征的经济社会，这种结构的建筑材料仅由那些足以满足经济运行的要素组成。门格尔宣称，这些基本因素是人类的需求、自然资源以及对需求的完美满足的渴望²⁴。对于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来说，物理本质和人的本质共同决定了经济世界的结构。维塞尔比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更强调经济秩序中的人为因素。奥地利学派的本体论（ontological）立场颇为独特，例如英国古典学家西尼尔、凯尔恩斯（Cairnes）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方法仅表现出表面相似性²⁵。尽管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声称经济理论是“抽象推断（abstract speculation）”的产物，他从不相信经济理论家能够达到经济生活的绝对现实。

²¹ B. A. G. Fuller, op. cit., p. 57.

²² F. von Wieser: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p. 17.

²³ F. von Wieser, ibid.

²⁴ C. Menger: Untersuchungen, op. cit., p. 45.

²⁵ 参见 F. Maehlpup 的优秀论文：The Problem of Verification in Economics. The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XXII, July 1955, p. 6.

对于穆勒来说，抽象推理仍然基于假说性的假设²⁶。今天，只有三位先驱中最忠实的学生冯·米塞斯保持着经济规律的本体论特征。他本人的行动理论（用他的话说，行动学）是“一种对行动本质的深思（reflection）²⁷”。经济法则提供了“本体论事实²⁸”。如果理性的个体在自由市场中行动，本体论结构就会具体化。此外，米塞斯的老师们对自由市场机制有着强烈的偏爱，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基本要素的合作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庞巴维克的巨著《资本和利息的正面理论》（“The 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 and Interest”）是展示自由放任机制下自然秩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达到自由竞争的长期价格（Dauerpreis），则利息贴现理论和迂回生产²⁹。

类似的推理序列可以在维塞尔的出版物中找到：得出法则是由社会经济的“意义”驱动的。维塞尔社会经济中的“意义”包含了个人自由与秩序的融合³⁰。

显然，在这个领域中，无法找到三位作者之间深远的差异。这三位作者都是社会**本体论者**。他们相信存在一个总体的现实计划。所有的社会现象都与这个总计划有关。这种现实结构“既是逻辑起点，又是有效性标准³¹”。本体论结构不仅表明是什么，而且表明应该是什么。人将理解精打细算的本质，然后必须组织他的使永恒的工具论（organon）的无摩擦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化。社会本体论跨越了纯粹沉思和道德行动之间的边界。

对社会本体论的信仰与逻辑范畴相关联，这些范畴更能将维也纳学派与洛桑学派（以及，最终，与所有西方理论思想）区分开来。瓦尔拉斯声称自由市场中的经济力量是相互依存的，并将相互调整为一般均衡。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看法不同：经济力量的结构是由一个最终原因——边际效用——产生的。

5. 有共同起源的因果关系

边际效用的中心位置对于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系统来说是典型的。正如庞巴维克所说，主观价值是整个经济分析的“芝麻钥匙”³²。仅消费者估值就可以解释成本、价格、利率，甚至是经济的扩张。经济行动的链始于消费者的理性决策。马歇尔不接受奥地利学派的定论。他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必须决定是主观价值还是成本决定价格，他声称，这两个因素像一把剪刀的两把刀片创造了交换比率³³。对于马歇尔，价值与成本，供给与需求是相互依存的要素，其函数联系可以用方程或几何图形来解释。对于维塞尔、门格尔，特别

²⁶ F. Machlup, *ibid.*

²⁷ L.v. 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New Haven: 1949, p.39.

²⁸ L.v. Mises, *op. cit.*, p. 756.

²⁹ E. von Böhm-Bawerk: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II. 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tals*, Vol. I, 4th edition, Jena: 1921, p. 383.

³⁰ 在《社会经济学理论》中，自由仍然是一项指导原则。参见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 in *Grundriß der Sozialökonomik*. Tübingen: 1914, p. 397, et seq.

³¹ 本体论的描述取自 D. Bidney: *Anthropological Thought* in P. A.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Ernst Cassirer*. 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Inc., Evanston, Illinois, 1944, p. 469.

³² E. von Böhm-Bawerk: *The Austrian Economist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I., 1890/1, p. 365.

³³ 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1952, p. 290.

是对于庞巴维克来说，消费者的需求是因果关系的开始和结束。经济行动的目的和原因是相同的。庞巴维克声称，因果关系和目的论（teleology）之间没有区别³⁴。他知道自己论点的亚里士多德起源。庞巴维克的来源是弗里德里希·保尔森（Friedrich Paulsen）的《哲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这并不重要。保尔森用希腊哲学家的权威捍卫了他将目的论和因果关系结合起来的观点：“……运动进行的第一个原因，目的（τέλος），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也是 ὁθεν ἡ κίνησις。然而，目标不是永恒的目的，而是**实现的整体**（强调为保尔森所加）……；这是亚里士多德的隐德来希（entelechy）³⁵。”

亚里士多德的隐德来希（ἐντελέχεια），从潜能到实现的运动不仅决定了系统的结构，还决定了思想的呈现。实现的过程最好用虚构历史的形式来解释，其中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展示了鲁滨逊·克鲁索经济如何逐步变化为一个全面发展的经济。这是一个展开的过程，其中的顺序最好用文字来解释。

维塞尔声称，这个展开的过程也可以用来弥合理论和经验现象之间的差距。维塞尔写道，为了阐述法则，经验现象被重新排列，以便可以给出简化的描述。通过注入越来越现实的假设，描述变得更加复杂并接近现实³⁶。这就是维塞尔的拒绝抽象的过程。尽管他公开承认经验主义，但在这方面，维塞尔将他的想法融入了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同事们所发展的思维模式中。像门格尔和庞巴维克一样，他的系统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边际效用、哲学实在论和社会本体论。

6. 经济理论与智识氛围

仅靠价值理论——而不是实在论或社会本体论——就使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声名鹊起。但主观价值论并不是维也纳学派独特标志。不仅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也发现了主观评价。边际偏好是三个新学派的共同要素，因此不能成为区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与洛桑学派和英美作者的独特要素。

剩下的两个原则，即哲学实在论和社会本体论将维也纳学派与德国历史主义区分开，更重要的是，将维也纳学派与在洛桑和英国开始的新科学尝试区分开。为什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奥地利的智识氛围很可能解释了这种分道扬镳。在维也纳所教授的书籍和讲座中强调的相同思想也可以在奥地利学派思想史中找到。

³⁴ E. von Böhm-Bawerk: 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tals, 2nd volume, Excuse, Jena: 1921, p. 177, et seq. 有关此论点的现代版本，请参阅 M. N. Rothbard: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Utility and Welfare Economics, in M. Sennholz, Ed. On Freedom and Free Enterprise. Essays in honor of Ludwig von Mises. New York: 1956, p. 236.

³⁵ F. Paulse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Thilly, 2nd American edi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third German edition, p. 219. 另见 L. Robin: Aristotle. Paris: 1944, p. 129. 在莱布尼茨那里也可以找到对因果关系和目的论的类似识别，参见 R. Eisler: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schen Begriffe, 4th ed., Berlin: 1927. Vol. I, p. 815.

³⁶ F. von Wieser: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p. 23/24. 同一作者: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 p. 135.

奥地利经济学家们继承了他们的思维模式，他们在奥地利知识分子的发展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莱布尼茨、博尔扎诺）、天主教异端（詹森和米格尔·德·莫利诺斯）、约瑟夫一世皇帝、政治家梅特涅，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诗人（格里尔帕泽、斯蒂夫特和安增鲁伯）³⁷。在这份群星荟萃的名单中，所有的哲学家都是实在论和本体论者。从中世纪到 19 世纪下半叶，奥地利人教授和研究本体论系统³⁸。也许亚里士多德比其他人的影响更大，因为中学经常会教他。维也纳肖顿中学

（Schottengymnasium）是许多著名的奥地利人（包括维塞尔）的智识幼儿园，即使在 1918 年之后，他们也要求学生阅读希腊文原版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虽然肖顿中学仍然教授亚里士多德哲学，但在 19 世纪末，在维也纳大学，传统本体论的影响正在减弱。经验主义（即知识的主要形式是对感觉数据的简单认识的假设）成为奥地利知识分子生活的主导力量。马赫曾在维也纳任教，他在二十世纪的追随者（维也纳圈）建立了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³⁹。

维也纳学派关于知识的思想清楚地反映了奥地利的传统。但社会本体论的思想包含了一些与奥地利学派思想的总趋势不一致的元素。

这三位作者的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表明了这些不一致。三位先驱在相互排斥的两种思想之间左右为难。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站在亚当·斯密和奥地利政府和行政部门的政治智慧之间。亚当·斯密和他的学派相信天意（providence）在理性行动的个人的帮助下，创造了一个和谐运作的自我导向机制。19 世纪上半叶，自由竞争被法国和英国的舆论欣然接受，并被许多政府谨慎地实施，但哈布斯堡王朝却没有。直到 1848 年，还有一本基于亚当·斯密原则的经济学教科书未被奥地利政府允许出版⁴⁰。在维也纳审查员的眼中，亚

³⁷ 为了解释哲学和政治思想，查阅了以下出版物：

T. von Borodajkewicz: *Die Kirche in Österreich. Erbe und Sendung im deutschen Raum*, Ed. J. Nadler and H. von Srbik. Salzburg-Leipzig: 1936, p. 263, et seq. W. Deinhardt: *Der Jansenismus in deutschen Landen*. München: 1929. H. C. Lea: *Molinos and the Italian Mystic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 p. 243, et seq. R. Mühlherr: *Ontologie und Monadologie in der österreichischen Literatur des XI. Jahrhunderts*. *Festschrift der österreichischen Nationalbibliothek*. Wien: 1948. H. von Srbik: *Metternich, der Staatsmann und der Mensch*. 2 vol. München: 1925. The same author: *Geist und Geschichte. Vom deutschen Humanismus bis zur Gegenwart*. München: 1951, Vol. II, p. 86, et seq. F. Valjavec: *Der Josephinismus*. Brünn: 1944. Same author: *Die Entstehung der politischen Strömungen in Deutschland 1770--1815*. München: 1951. E. Winter, ed.: *Bernard Bolzano, Bolzano Brevier*. Wien: 1947.

³⁸ R. Mühlherr: *Ontologie und Monadologie* loc. cit., p. 489, 490. 关于莱布尼茨的影响，见：A. Tibal: *L'Autrichien. Essais sur la formation d'une individualité nationale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36, p. 145, et seq.

³⁹ 参见 E. Mach: *Erkenntnis und Irrtum*. Leipzig: 1905. 关于马赫和维也纳圈子之间的联系，参见 R. von Mises: *Kleines Lehrbuch des Positivismus. Einführung in die empiristische Wissenschaftsauffassung*. The Hague, Holland: 1939.

⁴⁰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Die Grundlehren der Volkswirtschaft*）一书由约瑟夫·库德勒（Josef

当·斯密是一位革命者。自由放任的原则与古老的奥地利政治家和社会哲学背道而驰。

禁止这本书的人认为父权国家是明智的，公民没有足够的智慧来负责自己的福利。大公、总理、大臣们都认为自己是社会工程师，必须监督和规范社会机制。

这三位经济学家试图在英国和奥地利传统、自由竞争和家长式官僚主义之间做出妥协。与他们的理论假设一致，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应该是自由竞争的捍卫者。他们对得出这个结论犹豫不决。与第二代不同，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他们宁愿用微弱的赞扬和强烈的批评来谴责自由放任。

门格尔抗议将曼彻斯特哲学与边际主义混为一谈⁴¹。1892年，庞巴维克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来介绍了奥地利学派的新经济期刊⁴²。他写道，经济学家必须超越自由竞争和国家干预。在他二十年后撰写的演讲中，他声称无节制的自由竞争可能会导致生产和消费的无政府主义⁴³。维塞尔的想法是相似的。在他的《社会经济理论》中，他比较了自由竞争的利弊。他不太确定自由竞争的好处是否平衡了坏处⁴⁴。维塞尔抱怨说，伟大古典的追随者将自由放任的教条应用于一个过于复杂而无法由单一原则控制的经济体系。与他的追随者相反，亚当·斯密太聪明了，不提倡无限制的竞争。维塞尔越年老，就越远离自由放任的政治纲领，远离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权力的法则》（*The Law of Power*）中，他写道：社会效益的最大值从未达到，自由必须被秩序体系取代⁴⁵。

维塞尔回到了1848年之前那个时代的传统秩序观念。这个幻想破灭的老人完全屈服于梅特涅（*Metternich*）政策的智慧，可以浓缩为以下几个词：秩序而非自由，稳定而非进步。稳定这一原则，创造了奥地利传统与新经济学之间的新的紧张关系。自李嘉图的时代起，经济学家们试图将分析从受限的静态领域扩展到动态领域。1848年前哈布斯堡王朝的行政官和政治家也并不热衷于进步——动态的最重要阶段。

仁慈的专制体制并不适合改变。社会结构需要稳定。梅特涅的主要信念是，社会创新可以公平地创造革命。技术改进未被排除。它们是改善群众所需要的。平民百姓最关心的是安全、和平和更高的生活水平；梅特涅认为，这些

Kudler) 撰写，他于1821--1848年在维也纳大学任教。（*Geschichte der Wiener Universität von 1848-1898*, herausgegeben vom akademischen Senat der Wiener Universität, Wien: 1898, p. 170.）

⁴¹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arl Menger, Vol. III, London School, No. 19. Series of reprints, p. 83.

⁴² E. von Böhm-Bawerk: *Unsere Aufgabe*. Zeit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Sozialpolitik und Verwaltung, Vol. I, Vienna: 1892, p. 1.

⁴³ E. von Böhm-Bawerk: *Nationalökonomie*, p. 232. 这是维也纳某书店制作并出售给学生的他的讲座的非正式平版印刷副本。纽约市第42街主图书馆和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都有一份。根据这本古玩的统计资料，这些讲座不可能在1911年之前进行。

⁴⁴ E. von Böhm-Bawerk: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II. Positive Theorie des Kapitals, Vol. I, Jena: 1921, p. 232, et seq.

⁴⁵ F. von Wieser: *Das Gesetz der Macht*, Wien: 1926, p. 46/7, 427, 525--535.

目标可以通过他的政策实现⁴⁶。如果社会秩序应该保持不变，那么个人就必须保持他的社会地位。人应该对他在社会中的地位感到满意。在卑微的环境中过着幸福生活的微不足道的人也是斯蒂弗特的小说和安祖鲁克的戏剧的典范⁴⁷。

但是，一成不变的经济和社会的田园诗与 1850 年后快速发展的奥地利工业并不协调。作为本国经济发展的观察者，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无法不分析动态就写出经济论文，但他们向往一成不变的旧经济的典范。

通过一本杰作，庞巴维克将进步和稳定融合在了一起。对《资本正面论》（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有深刻理解的路德维希·M. 拉赫曼（Ludwig M. Lachmann）教授写道：“庞巴维克的世界是一个进步受限的奇特世界，进步只有一个方向：资本积累……⁴⁸”既没有需求的变化，也没有投资的波动，也没有困扰着迂回生产的不断扩展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干扰。自然秩序在“美丽和谐”中扩展。庞巴维克于 1911 年告诉他的维也纳学生，社会稳定比进步更有价值。他宣扬类似于奥地利过去典范的社会寂静主义（quietism）。在作为社会等级必须被保留，穷人应该满足他的卑微需求，富人应该避免过度奢侈，将钱花在慈善事业上。庞巴维克教导到，危机的最有效预防，是稳定不变的消费⁴⁹。在这方面，必须提到的是庞巴维克从未发表商业周期的系统理论。

维塞尔对动态的看法没有庞巴维克那样死板。与熊彼特一样，维塞尔写道，经济进步是由创新的企业家开始的⁵⁰。然而他补充说，承担风险的企业家的日子屈指可数，商业领袖将不得不应对有组织的劳动力，这将摧毁资本的绝对霸权。随着工会的出现，达到了新的稳定秩序。由商业企业开始的动态导致了一种静止的情况⁵¹。维塞尔断言，新的稳定的经济秩序会比由投机者、银行家和技术人员引导的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时期更好。维塞尔完全公正地看待生产力的提高，但他也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群众的无产阶级化、苦难和缺乏自由。没有一个新的组织，国民经济就变成了反对国民的经济⁵²。维塞尔在这里听起来像是他的对手卡尔·马克思。但相似之处只是表面的。马克思谴责工业社会是不公正的。维塞尔批评他的当代经济是因为它基于权力而非慈善。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权力的社会学》中，维塞尔极力强调慈善是最高的美德。

⁴⁶ H. von Srbik: Metternich, Vol. I., p. 381-384.

⁴⁷ R. Mühlherr: Ontologie und Monadologie op. cit., p. 496, et seq. 在 1848 年革命之前，颂扬简单满足的生活是整个中欧生活的典型。虽然写得更早，但盖勒特的诗最能描述这种态度：

Geniesze, was Dir Gott beschieden,	享受上帝赐予你的
Enthehre gem, was Du nicht hast,	欣然面对那些你不拥有的
Ein jeder Stand hat seinen Frieden,	每个阶级都有它的宁静
Ein jeder Stand hat seine Last.	每个阶级都有它的负担

⁴⁸ L. M. Lachmann: Capital and its structure. London: 1956, p. 79.

⁴⁹ E. von Böhm-Bawerk: Nationalökonomie, op. cit., p. 383/4, p. 440.

⁵⁰ F. von Wieser: Theoric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 op. cit., p. 354.

⁵¹ F. von Wieser, ibid.

⁵² F. von Wieser :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 op. cit., p. 354.

这是一部关于权力、贪婪和自私的社会学的作品的结局。我们不应忘记，维塞尔是在一个天主教国家写作的，自古以来，在讲坛、书籍和小册子中都在宣扬慈善事业。就连不轻易表露感情的庞巴维克也受到了宗教环境的影响。他惊呼：“在社会科学中，内心（heart）比头脑（head）更有价值。⁵³”然而，维塞尔比庞巴维克更明确地表达了慈善将战胜野蛮力量的希望。他与阿达尔贝特·斯蒂弗特分享了这一愿景，后者可能影响过维塞尔。据我所知，在维塞尔的作品中从未提到过斯蒂弗特⁵⁴。思想上的巨大相似性使我认为，这位来自波希米亚奥伯普兰的教师，与奥匈帝国最后一位贸易部长之间存在精神纽带。早在维塞尔之前，斯蒂弗特就强调了兄弟之爱的温和法则，最终将战胜力量的荣耀和对不道德的天才的崇拜⁵⁵。两者都看到了权力的邪恶。斯蒂弗特说：“如果复仇接踵而至，那么第二次复仇之后是第三次……如此下去，直到没有人……活着⁵⁶。”两人都同意，刀剑所得之利，必将毁灭胜者，如福音所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⁵⁷”。随着权力的谴责，斯蒂夫特结束了他的讲道；不是那么维塞尔。他承认，领袖的力量是历史上创造新政治领域和新生产形式的驱动力。武力现在仍然是一种必要的邪恶。两人都希望出现这样一个时代，其中基督教慈善机构接管现在权力所扮演的角色。双方都希望兄弟之爱的温和法则最终能战胜野蛮。这种信念由维塞尔以一种斯蒂弗特自己可能会写的文字表达出来：“内在力量以安静且几乎难以察觉的叩击（Schlägen）起作用，尤其是在开始时。这种力量会非常缓慢地赢得胜利，因此公众舆论不会意识到它⁵⁸。”

人们很容易蔑视胜利之爱的梦想，但这样做的人却忽略了维塞尔和斯蒂弗特的社会信息的意义。兄弟之爱的最终胜利构成了目标，尽管存在强权政治、劳工骚乱以及旧奥地利存在的所有苦难，这位政治家仍在为之奋斗。

历史学家应该毫无偏见地指出奥地利经济政策背后的社会愿景。但有时他不禁要问，这个宏大的社会生活概念是否与奥匈帝国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

在大工业时代，权力能被无限制地谴责吗？在捷克、波兰、克罗地亚等国家要求自由的时候，自由能被成功压制吗？社会主义工人是否对社会下层平静幸福的布道感到满意？稳定秩序的梦想是否与经济变革和即将粉碎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力量相冲突？这是一种可悲的疏忽之罪：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两位国家

⁵³ E. von Böhm-Bawerk: *Unsere Aufgabe*, loc. cit., pp. 9, 10.

⁵⁴ 维塞尔提到斯宾塞（Spencer）的逻辑和托尔斯泰（Tolstoj）的小说《战争与和平》是塑造他青年时期社会学观点的作品。F. von Wieser: *Arma virumque cane*. 纪念肖顿中学一百周年的演讲。Gesammelte Abhandlungen, op. cit., p. 338. 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J. Viner 认为 19 世纪自由的法国天主教徒可能是维塞尔思想的来源。我很抱歉我不得不不同意这位伟大的学者。我不相信自由的法国天主教对奥地利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拉梅尼斯（Lamenais）试图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与天主教结合起来的努力不符合维塞尔的思想模式。另一方面，奥地利的上层和下层都阅读斯蒂弗特的简单故事。

⁵⁵ A. Stifter: *Bunte Steine*. Vorrede. Leipzig: Reclam. s.d., p. 29.

H. Kunze: *Adalbert Stifter. Mensch und Wirklichkeit*. Berlin: 1950. p. 148.

⁵⁶ 引自斯蒂弗特的小说《维蒂科》（Witiko）。见于 E. Fechner: *Recht und Politik in Adalbert Stifters Witiko*, op. cit., p. 15.

⁵⁷ St. Matthew. 26.53.

⁵⁸ F. von Wieser: *Das Gesetz der Macht*, op. cit., p. 6.

部长，以及前公务员和皇储老师门格尔，他们以非学术身份处理了帝国的所有大小事宜，却并不觉得有必要彻底修改他们的社会理想。但这种批评只对我们有效，对他们无效。根据作者们自己的说法，社会计划不是由思想家任意制定的，而是由自然决定的。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看来，政治计划和科学思考都不是自发的行动，政治家和学者都不能创造全新的东西，他们的功能是呈现和具体化隐藏的自然秩序。

7. 本研究的意义

我坚持认为，用实在本体论的工具寻找这个隐藏的秩序为理解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和经济政策提供了新的线索。门格尔伟大的方法论是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术语和模式中编写和构思的。庞巴维克对有共同起源的因果关系、边际效用在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地位的辩护，三位作者对功能主义和数学的强烈反对都来自亚里士多德的隐德来希。经济社会本体论概念的不一致解释了他们的经济政策在自由和权威之间来回不安的摇摆不定。

本体实在论和古老的奥地利家长式作风是奥地利思想史上的主要主题。奥地利学派的经济体系不可能在欧洲西部被写出来。自中世纪以来，各种生活方式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在为个人权利而斗争。奥地利只有两次革命（都没有成功）：18世纪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和1848年维也纳和匈牙利反对皇权的革命。在这两次里，个人的目标都失败了。

自1800年以来，我们无法指出一位伟大的英国或法国经济学家可以既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同时又同情开明的专制秩序。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伟大成就与维也纳巴洛克或莫扎特和海顿的音乐一样具有典型的奥地利特色。与这些艺术作品一样，关于经济的书籍具有国家和国际双重性质，它们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并获得国际认可。